

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

韓愈散文選集

◆ 顧易生 徐粹育 編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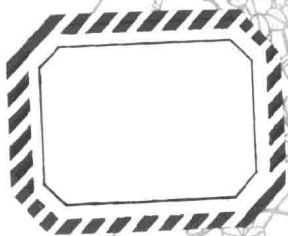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

韓愈散文選集



◆ 顧易生 徐粹育 編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



責任編輯 倉陽卿

書 名 韓愈散文選集

(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

編 撰 顧易生 徐粹育

聯合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發 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印 刷 上海市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 本 787×1092 1/32 插頁2

字 數 208,000

版 次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張 9.125

印 數 1 - 5,000

書 號 ISBN 7-5325-2245-8/I·1140

定 價 12.60元

《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

編纂出版說明

中國古代散文，興于春秋戰國，歷經漢魏，踵事增華，至唐宋嬗變創新，豪擁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等八大家爲傑出代表的作家羣，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八家的散文理論和創作，皆具獨詣，各樹豐碑，使散文藝術臻于極致，在中國文學史上鑄刻了光耀千秋、惠澤萬代的煌煌巨章。

這套《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叢書，係從我社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出版的《中國歷代散文作家選集》大型叢書中輯出。現將叢書編例說明如下：

一、《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共七冊，內中蘇洵、蘇軾合爲一冊，其他六家各爲一冊。

二、諸家選集的人選篇目，力求體現該作家各時期的創作風貌。作品的編次，大抵以寫作時間先後爲序，無法編年者置于最後。原文一般以近期出版較完善的點校本爲據，槧本多而又無點校本者，擇善而從。各版本異文一般不注，關係到內容理解者則加以注明。

三、各集均有“前言”，介紹該作家生平、思想、創作歷程，着重分析其散文風格的形成與發展變化，提示其創作成就及在文學史上地位等。

四、古代的言文，向不一致。爲便于讀者理解和欣賞原作，對於入選的每篇作品，均作“題解”、“注釋”和語譯。

竭誠歡迎讀者對本叢書編纂工作批評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五月

前言

韓愈，是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一、“古文”與“古文運動”

唐人倡導“古文”，以恢復先秦和漢代散體文為號召，和魏晉以至當時流行的駢體文——被稱為“時文”者相對而言；所謂“古文運動”，實為散文的革新運動。古代散文，如《左傳》、《史記》等歷史散文，《孟子》、《莊子》等哲理散文，都富有藝術特色，奠定古典散文的基礎，却主要還是學術著作，那時可稱為純文學的是詩歌與辭賦。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曹丕《典論》的揭示“詩賦欲麗”到蕭統《文選》的標舉“義歸乎翰藻”而不錄經子史傳，反映了對文藝特徵的認識的進展，與文學概念的逐步形成。這時期對偶聲律之學的興盛，進一步豐富了文藝形式之美，形成了屬對工整、辭采華麗的駢文，這是美文的發展。然而駢體由風靡文壇而成為凝固的程式，句句都要講對仗、協聲韻、堆砌典故華藻，必然“燕音累句”泛濫成災，變為表達情事的桎梏。因而從南北朝後期到隋、唐，已引起不少人的反對。如後周蘇綽仿《尚書》文體作《大誥》以為標準，時稱“古文”；隋李諤上書文帝請革“文華”，學者王通也排斥聲律。唐代

王勃、劉知幾、陳子昂、蕭穎士、李華、柳冕等對駢偶靡麗之風多所批判，爲古文運動作前驅。然而他們在理論上和創作上都還不夠成熟，往往片面宗經復古，過分否定文學藝術的作用，甚至對屈原、宋玉的辭賦以至建安曹氏父子文藝傾向都一概否定。這實際上否定了一千年來文藝創作從經史等學術論著中獨立出來的進步過程。他們自己所作，有的仍用駢體（如李諤、劉知幾之書），或者擬古不化，缺乏藝術魅力（如蘇綽、王通等作）。韓愈、柳宗元起於中唐，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完整而辯證的文學理論，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散文作品，兼收並蓄經傳子史以至辭賦駢文的藝術特點而有自己的創造，還培養團結了一批作者，在文壇上掀起了聲勢浩蕩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展推向到新的階段。宋代以至明清，許多散文家大都是繼續他們的道路前進的。明人把韓、柳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並稱爲“唐宋八大家”，而韓愈在其中起着主導作用，這爲明清許多散文批評家所確認。〔注〕明代高唱“文必秦漢”的何景明說：“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與李空同論詩書》）則從另一角度展示了韓愈的古文實爲一種新型的散文，在文學歷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注〕明初朱右編錄《八先生文集》，中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通行，而這一散文作家羣之名遂定。清代八家文的選本頗多，有張伯行《重訂唐宋八大家文鈔》、魏源《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等。姚鼐《古文辭類纂》中，八家的作品佔了很大比重。這些編者大都給韓文以最高評價。

二、韓愈的生平和散文創作道路

韓愈，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謂郡望昌黎（今河北盧龍），世稱韓昌黎。父仲卿，曾爲縣令、秘書郎，與李白、杜甫交遊；叔雲卿，以文章著名於時。韓愈於代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生於京師長安（今陝西西安），三歲喪父，由其兄韓會撫育。韓會也頗有文學修養，與其叔雲卿同遊於古文家蕭穎士、李華之門，與梁肅等鼓吹宗經復古。韓會初在京師任起居舍人，後貶韶州（今屬廣東）刺史，韓愈均隨其前往。韓會病故，十三歲的韓愈隨嫂鄭氏回到故鄉河陽。由於中原戰亂，韓氏全家遷到江南宣城（今屬安徽）。少年的韓愈刻苦攻讀，其《與邢尚書書》自稱：“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復志賦》中回憶說：“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這爲他後來從事提倡儒道和古文打下了基礎。

德宗貞元二年（公元786年）時，韓愈十九歲，到長安去準備參加進士考試。可是，在貞元四、五、七年三次應進士試都失敗了，直到八年第四次應試才得金榜題名。但唐代制度，士子中進士後還須經過吏部考試，方得正式爲官。韓愈於貞元九、十、十一年他三次應博學宏辭科考試，皆未入選；又三次上書宰相希求引薦，也是泥牛入海。十一年五月，憤而離開長安東歸。當初他懷着勃勃雄心來到京華，在近十年的風塵歲月中，不斷應考，不斷向達官貴人上書干謁，可是不斷的蹭蹬，功名無就，衣食困窘，心情非常痛苦。然而，他還是積極堅韌地干預生活，表現自己的志向與文才。他曾寫長文《爭臣論》對諫議大夫陽城進行批評，實

也是顯露自己政治理想與文學觀念的頭角崢嶸。在《應科目時與人書》等干求之作中，深刻反映了當時抱負宏大而人微言輕的知識分子心態與處境。《說馬》等抒發不平之鳴的雜文，可能也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韓愈回家以後，與朋友談書品畫，過了幾天優遊的日子，簡潔閑雅的《畫記》即其時所作。

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韓愈應宣武軍節度使董晉之聘來到汴州（今河南開封）任觀察推官。十五年又至徐州（在今江蘇）任節度使張建封節度推官。他為人耿直敢言，因與張不甚相合，隔年夏，離開徐州到洛陽、長安。十八年得授國子監四門博士。歷任地方幕僚以至回到長安，是韓愈步入仕途與提倡古文運動的開始階段。在汴州期間，他與詩人孟郊定交，又有李翱、張籍等來向他學習古文，相互切磋。張籍曾批評他多尚駁雜無實之說，而韓愈的回信表示這是“吾所以爲戲”，堅持開拓文藝散文的園地，突破傳統“道”與“文”的範圍。在離徐赴洛途中，與侯喜、王涯、李翱同遊睢陽（今河南商丘），信筆作《題李生壁》，開小品文的先河。進京任教於最高學府後，韓愈在文壇的地位更提高了，他也樂於指導後進、勇於提携人材。向他學習古文的人很多，人稱“韓門弟子”。他的古文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進入第一個高潮，《圜者王承福傳》、《答李翊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師說》等光輝奪目的名篇，都產生於這個時期。

貞元十九年，韓愈被拜爲監察御史，與同官柳宗元、劉禹錫結爲好友。在此後古文運動中，韓、柳相互推重、桴鼓相應，共同發揮領導作用。雖學術觀點上有過不同意見的討論，但兩人的友誼是生死不渝的。

韓愈懷着濟時明道的宏願活躍於仕途文壇，無疑也屬夾着追求功名利祿的慾望，這點他常直承不諱，未嘗不是比那些假清高、假道學有其可愛之處。然而碰到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時，他總是不顧個人安危利害，挺身而出為民請命、為國除弊。十九年冬，他就對帝室宗親京兆尹李實的在嚴重自然災害時候還橫徵暴斂，向皇帝呈上《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進行諫論，因此被遠貶為陽山（今屬廣東）縣令。當時陽山是非常荒僻所在，從他在此所作《送區冊序》中可以看到其孤寂境況和心情。序文於韓文別開生面，而與柳宗元後來謫居永州後所作諸記風格相近。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這年八月改元“永貞”），德宗去世，順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進行政治改革，柳宗元、劉禹錫均積極參與其事。韓愈得赦離陽山赴郴州（在今湖南）待命。該年八月，順宗在宦官藩鎮等守舊勢力壓迫下讓位給憲宗。憲宗一上台，即對王叔文集團進行迫害，王被處死，柳、劉等都被貶為遠州司馬。韓愈剛調為江陵法曹參軍，他寫了《永貞行》等詩，對王叔文集團進行攻擊，對憲宗的處置進行熱烈歌頌，因而不少論者認為韓愈對永貞革新持反對立場，甚或認為他與王叔文有夙怨，與柳、劉有嫌隙。但考諸事實，這些推論並乏確證。按韓愈貶陽山時，王叔文等尚未當政，自與他們無關。他們當政時採取的重大措施如嚴懲貪暴權奸李實，禁止宮市弊政，減免人民賦稅，追復名賢陸贄、陽城等等，都是符合韓愈一貫主張的，在他後來所撰《順宗實錄》中都給予高度評價。他先前與柳宗元、劉禹錫的結交並非偶然，而此後他在述及兩人參加改革集團事時，也往往加以迴護。至於《永貞行》中如此云云，應屬在朝廷明定王叔文等的罪名後的表態之說，也許包含向

憲宗討好以求得到進用的意圖，當然不足為訓，却也不足為憑。參看本書所選《柳子厚墓誌銘》及《宮市》及其題解，對這個評價韓愈政治態度的關節問題，當有必要進行辨證。

韓愈被《新唐書》本傳稱為“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的系列大文章《原道》《原性》等“五原”，大概是在郴州待命三個月期間產生的碩果。他確實是努力實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的宗旨的。

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韓愈調回京師權知國子博士。三年，改眞博士分司東都洛陽，四年為都官員外郎。以上期間的重要作品有《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後叙》、《毛穎傳》等。後者以擬人手法為毛筆作傳，亦莊亦諧，是古文寫作新品種，時人都“大笑以為怪”，柳宗元則著文讚揚其為“盡六藝之奇味”、“有益於世”，給予有力支持。五年，韓愈改任河南令，在打擊宦官和藩鎮勢力的不法行為方面採取了堅決有力的措施。六年，回長安任職方員外郎。七年，又為國子博士。作《進學解》，當時宰相以其有“史才”，八年三月改任他為比部郎中史館撰修。這時他有《答劉秀才論史書》，稱“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表示不敢有所為作。這說法則受到柳宗元的嚴厲批評。韓、柳之間有一場關於天人關係的討論，大概也發生於這個時期。據柳宗元《天說》載，韓愈曾對他說：

人之壞元氣陰陽也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僵漚，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草金以鎔，陶甄琢磨，倖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衡衡，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

其結論是：天對有功者必給賞，對爲禍者將處罰。柳宗元指出：此說如是“有激而爲”，那確實是“辯且美”了；然而天地元氣陰陽都是沒有意志的物質，不可能對人“賞功而罰禍”。劉禹錫寫了《天論》上、中、下三篇，對兩人之說進行補充。近時哲學史論者，大都認爲柳、劉之說具有唯物精神，誠是確論；但指責韓愈所云爲唯心謬論，則可商榷。韓說也許別有精意，接觸到“生態平衡”問題。按今陝西一帶，秦漢時稱關中沃野千里，然經歷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長期破壞，至唐時已顯得糧食供應不足，不得不依賴江淮運輸。韓愈以文學家特有的敏感，覺察到了這種變化，不過未能作理性闡明。“人違反自然規律，將受到自然的懲罰”。這警語已越來越爲近代科學研究發展所證實。

韓愈在史官任上，曾在韋處厚三卷本《順宗實錄》基礎上，重新編撰爲五卷本。其中秉筆直書德宗晚年弊政，大膽地觸及宮禁秘事，對宦官藩鎮多有諷刺，因此爲當權宦官集團所惡，於穆宗、文宗朝幾次挾制皇帝下令修改。想見他修史時必也感到某種壓力，可見爲史者有“人禍”“天刑”之說或許是出於“有激而爲”吧。元和九年，他改考功郎中、知制誥。十年所作《藍田縣丞廳壁記》中抒發了有爲之士在官場習慣勢力鉗制下無所事事的憤慨，大概也有自己切身的體會。十一年，改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十二年，任裴度行軍司馬跟從征討淮西叛亂軍閥，謀畫有功。凱旋歸來，遷刑部侍郎，年過半百的韓愈總算躋身高官行列了。可是不滿兩年，素以“狂直”著稱的他，又幹出一件震動朝廷的大事，險些斷送老頭皮。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憲宗令迎接藏在鳳翔法門寺佛骨入京，韓愈遞上《論佛骨表》犯顏極諫，觸發憲

宗赫然震怒，初欲處以極刑，幸得裴度、崔羣等救護，遠貶爲潮州（今屬廣東）刺史。他在潮州不長的時間裏，做了一些好事，如興辦學校發展文教，防治鱷魚之患解除民衆疾苦，還寫下傳誦千古的《祭鱷魚文》。潮州人民深深懷念着他，在那裏建了“韓文公廟”保護至今。元和十五年春，韓愈移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仿效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經驗，以計算工資方法釋放奴婢七百餘人。這時柳宗元病逝於柳州，引起韓愈極大的悲悼，寫下了《祭柳子厚文》和被稱爲“昌黎墓志第一、亦千古墓志第一”的《柳子厚墓誌銘》。該年正月，唐憲宗去世，穆宗即位。冬天，韓愈調回到長安任國子祭酒（相當於校長）。次年，即長慶元年（公元821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奉命往鎮州宣慰叛亂的王庭湊。這是一項冒生命危險的任務，他義無反顧地直入虎穴，慷慨陳詞，完成使命歸來，轉吏部侍郎。此後曾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兵部侍郎，又轉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一代文豪卒於長安私第，諡爲“文”。後人也稱他爲“韓吏部”“韓文公”。在他這創作生命的最後階段，筆力更臻於爐火純青、自然高妙的境界。宋黃庭堅所謂“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與王觀復書》）。這是兼指他在潮、袁時期所作的。《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答呂黯山人書》、《送高閑上人序》、《柳州羅池廟碑》、《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等則，都是回到朝廷後的力作，閃耀着他生命力的最後光彩而永不熄滅。

三、豐富燦爛的散文理論與藝術成就

韓愈的一生，在政治、哲學、文學領域中均有建樹，而

主要成就則在文學，尤其是散文。他“以文爲詩”、開啟“文賦”之體，在詩賦發展史上也有其貢獻；同時他更融騷情賦采於散文，豐富發展了散文的意境和藝術手法。他的詩、賦、文爲有機整體而以散文爲核心。

對於散文寫作中的“道”與“文”（相當於思想性與藝術性）、繼承與創新的關係以至多種藝術風格與表現手法相結合的問題，韓愈都發表過富有辯證光芒的真知灼見。

在《原道》中，他標舉孔子、孟軻的儒家道統，然其具體論“道”時，却結合時代現實，頗有新意，並表現出若干異端傾向。例如《原道》開宗明義以“博愛”來解釋“仁”，使發展儒學中人道因素而與墨氏“兼愛”之說相鄰。《讀荀》中兼取“王”“霸”，《讀墨子》更調和孔、墨，《試進士策·其五》揭示“道”是“便於人而得於己”，肯定管仲的霸業、商鞅變法爲合於道，對孟軻的排斥墨氏、貶低管仲頗有微辭。《原毀》揭櫫以舜與周公爲榜樣；《伯夷頌》突出伯夷的“特立獨行”敢於“獨非聖人”（指反對周武王與周公）；《師說》強調“人非生而知之者”，也和孔子之說立異。當他論及“道”與“文”關係時，一般以“道”爲主。“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題歐陽生哀辭後》）；“修其辭”爲了“明其道”（《爭臣論》），而他所謂“道”的範圍却非常寬廣。《送孟東野序》發展了司馬遷“發憤著書”說，而提出“不平則鳴”之論。其中，肯定“六經”孔、孟、荀況之鳴外，對莊周、屈原、楊朱、墨翟、管仲、晏嬰、老聃、韓非、鄒衍、孫武、張儀、蘇秦、李斯、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以至唐代的陳子昂、元結、李白、杜甫，當時的孟郊、李翱、張籍的鳴聲，都連聲稱善。可以推想，凡是反映時代或個人矛盾衝突的不平之鳴，都屬於“明

道”範疇，包括鳥之鳴春、蟲之鳴秋。無怪近代林紓爲之驚歎：“舉禹、咎陶、伊尹、周公、孔子、孟軻、荀卿與蟲鳥同聲，今人斷無此文膽。”（《春覺齋論文》）可見其思想解放的程度。

《答張籍書》、《重答張籍書》中他一再宣稱自己的以文爲“戲”爲“惡（哪裏）害於道哉”！《送窮文》又自稱爲文：“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公然認爲文學創作可以作爲一種娛樂身心活動，而這也是合於聖人之道的。此說在散文理論史上允屬創舉。我們中有把韓文公看作渾身道貌岸然者，還請注意到他這一側面。

《送高閑上人序》把養由基射箭、庖丁解牛、師曠奏樂、扁鵲治病、奕秋下棋、劉伶的飲酒、張旭作草書，與堯、舜、禹、湯治天下並提，反映作者認爲文藝、技術之道與治國之道同等，這裏顯然有莊子文藝思想的痕迹。韓愈還時常表現出特殊的重“文”傾向。《答陳生書》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柳子厚墓誌銘》更把“文學辭章”的“必傳於後”看得比“爲將相於一時”更爲重要。

《答劉正夫書》指出：文章不同一般實用器物，必須有珍奇瑰異特點能令人愛賞；聖人之道如果用文，一定重用其能者；學習古代聖賢之書須要“師其意，不師其辭”，所謂“能”“意”主要指藝術上的獨創精神與鑄造文辭的功力，“能自樹立不因循者也”。《進學解》自述廣泛鑽研古代各種典籍的文藝英華，不論是渾厚浩瀚的、艱深澀奧的、醇正而華美的，奇妙而有法度的、謹嚴精煉的、鋪張誇飾的，都兼收並蓄。他學習儒家經傳如《尚書》、《周易》、《詩經》、《春秋》、《左傳》，不僅汲取其中的“道”，更借鑑其藝術特徵；而儒經之外，特別重視對文學性特強或純文

學的《莊子》、《離騷》、《史記》以至司馬相如、揚雄辭賦的借鑑。這就和他以前某些古文運動前驅者的態度有很大不同，也受到後來道學家的批評。宋朱熹《讀唐志》說他“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意謂韓愈肯定“文”的獨立地位，甚至置於“道”之上。

韓愈論及漢文，對司馬相如、揚雄的辭賦，一向表示其向慕之忱，而不及儒者董仲舒。這裏有着鮮明的傾向性。按揚雄初曾好賦，後來悔而不爲，以爲“孔氏之門”是“不用”賦的。又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麗”，既有美的意思，也有“駢偶”的意思。揚雄揭示賦的特點爲“麗”，爲曹丕“詩賦欲麗”說的先聲。那麼韓愈愛辭賦，當也越出了孔門之教，而對其駢偶聲韻與辭藻也有所吸收了。日本古田敬一《中國的對句藝術》說：“韓愈的古文之所以優秀，適當吸取了駢文的手法，我以爲是重要的一點。”

深厚廣博的思想人格修養與刻苦藝術修辭鍛煉相結合，宏偉充沛的氣勢與自然靄婉的風格相結合，“詞必已出”、“怪怪奇奇”與“文從字順各識職”相結合，剛與柔、奇與偶、韻與散、古與今相結合，融會貫通各種藝術手段、不專一能而戛戛獨造、別開生面：“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這些精光四射的散文理論，是韓愈讀書和寫作經驗的結晶，也充分貫徹、體現於其創作實踐之中。他不僅繼承、發展了傳統散文中說理、記實諸體，賦予雄奇磅礴之氣、形象情韻之美，更創作了大量融

抒情、狀物、敘事、議論於一爐的文藝散文。有些過去以詩賦駢文寫的題材，他也以散筆去馳騁。有的文體如“雜說”等，則屬他所新創。一般寫哀祭文都用韻語，他的《祭十二郎文》却純為散行，堪稱無韻之《離騷》；《子產不毀鄉校頌》為整齊頌辭，却自然流暢，宛然口語；《送李愿歸盤谷序》兼有六朝的流麗，《進學解》的錯綜漢賦壯采，實開“文賦”之先河；《毛穎傳》、《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等，更與唐代新興的傳奇小說相互映輝。“昌黎之文，每篇成一體。”全部韓文體裁風格豐富多采，諸凡賦、論、說、辨、解、讚、頌、傳記、書信、贈序、哀祭、碑志、表狀，以及其他雜文，都有卓越成就，而且大多數篇章各具匠心，鉅構短制，都極筆力騰躍變化的能事。作者還創造了許多成語，或融化前賢語句而推陳出新，或提煉時人口語而自鑄偉詞，大大豐富祖國的語言寶庫。宋代秦觀《韓愈論》說他是散文的“集大成者”，稱為中國古代第一流的散文大家和語言大師，韓愈是當之無愧的。宋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這是對韓文風貌有代表性的概括。蘇軾《韓文公廟碑》，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強調了韓文功績，至若一概抹煞東漢以後文學的成就，未免也屬“此論未公吾不憑”（借用蘇軾詩句）的。

韓愈的說理文，時有精闢透徹的議論，發人深思的見解，意雲闊，氣象不凡，深蘊說服力量。但他畢竟主要是文學家，而不是體系嚴密的哲學家，縱筆所至，不覺自陷於矛盾的情況有時也是有的。以致受到過蘇軾《韓愈論》以及章太炎《論式》的批評。他還有些創作刻意追求詭異，充斥